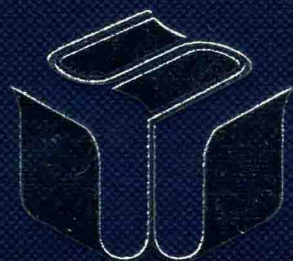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人物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何远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人物卷

总 主 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何远景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人物卷/何远景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何...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 ②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内蒙古
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3935 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人物卷
主 编	何远景
责 任 编 辑	周 虹
封 面 设 计	敖全英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1000 千
版 期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 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180.00 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古,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古,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 118 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 2011 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讫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 1000 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辑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内蒙古人物研究略述

内蒙古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期,在内蒙古 118.3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就有人类活动,创造了大窑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诸多文明,呈现出百花纷呈的势态。无论是精美的玉龙,还是粗糙的石斧、陶罐,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无论是简陋的屋舍,还是草率的墓穴,都凝结着先人的精神寄托。在以万为计量单位的年代里,那时的内蒙古人在这片大地上就演出了辉煌的历史壮剧,出现过很多叱咤风云的英雄,更有不少将文明一点点向前推进的发明家和科学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许多内蒙古人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超乎常人的业绩,有的达到或超越了全国乃至世界水平。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内蒙古六十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编纂《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人物卷》(以下简称《人物卷》),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学习运用一百年来内蒙古人物的研究成果。

编纂《人物卷》,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人物的选取可能会有很多矛盾、很多争议,编纂的难度也很大。要在无以计数的内蒙古人物和 4000 多条以人物为主题的文章篇目中选择六十多位人物、七十多篇文章,其难度何止倍蓰;可选取的人物或文章很多,但受到本卷篇幅限制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选录的人物整体结构复杂,把握不准容易引起争议;有些人物正面影响很大,但以目前的能力和水平还没有录选到研究性文章,可能会挂一漏万,等等,这些都是我的一种思想负担。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古文献专业,做了几十年古籍编目工作,虽挂了个历史学硕士的名号,但研究历史人物并不在行。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领导聘我担任《人物卷》主编,我感到在选人选文上由于自己的专业能力有限,难以把握,确实勉为其难了,经再三推辞,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做了。虽然深感压力很大,责任很重,但亦觉得是对我的信任,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通过近两年多编纂《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选录的 10 余万条文章篇目均由我一手分类整理,对整套书的形成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故而编纂《人物卷》还是充满信心。

经过近半年的编纂工作,我从 4000 多条以人物为主题的文章篇目中,选择了 69 位人物、79 篇文章,形成了《人物卷》的样本。为了保证《人物卷》编纂的合理性、准确性和稳妥起见,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领导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召开了专家学者论证会,对《人物卷》样本进行了专项论证,确定了选人选文标准和原则,即:

——弘扬正能量的原则。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与前言中提出的选取“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吻合,尽可能选取“正面”人物的研究文章。

——突出文史研究的原则。找准研究性成果这一定位,尽可能选取研究性文章。但有些有重大影响力、知名度高的历史人物没有研究性文章未能选取;当代人物研究性文章很少,所以选取的多为传记性、记述性文章。

——保证质量和品位的原则。为提高本卷的影响力和可读性,尽可能选取名刊、名报、名人的文章。

——年代顺序排列的原则。从西汉冒顿单于开始至当代,尽可能选取每一时代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人物的文章。

——文章数量导向的原则。有影响力、知名度高的人物研究性、记述性文章就多,多者达几百篇,则这类人物的历史地位较重,影响力较大,尽可能选取这类人物的文章。

按照专家学者们议定的选人和选文的标准、原则,对《人物卷》样本初选的79篇文章进行鉴别和筛选,做了增补和删减。所有这些,都是对我编纂《人物卷》予以的大力支持,也减轻了我的编纂压力。

人类的步伐走进文字时代,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词汇是:鬼方、混夷、玁狁等,古籍中提到这些名词时,常常寥寥数语,语焉不详。有些古籍把“獯鬻”解释为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桀的儿子,夏桀死后,他带领着桀的众妾,在中国北方游牧,成为匈奴的祖先。这些让一般人看起来有些头痛的字眼,在现代学者看来,这些很可能是当时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其中一种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它们可能都是匈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

匈奴人中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物是“冒顿单于”。《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记载了这位匈奴单于的一生。本卷遴选人物,以冒顿为首,所选文章内容,大体上是对《史记·匈奴列传》有关冒顿单于文字的诠释。《评冒顿单于》一文把他称为“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史上的第一位英雄”,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

“蛾眉一笑塞尘清”,这是唐代诗人汪遵歌咏昭君诗句。昭君是中华文化中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从元杂剧《汉宫秋》到电视剧《昭君出塞》,昭君成为一个久盛不衰的主题,借昭君以抒发情怀的诗歌,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昭君祖籍湖北,却是在《人物卷》选择人物时永远也无法回避的身影,否则如何面对北地草皆白,而其上独青的“青冢”。

翦伯赞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王昭君有较深厚的兴趣,还写过一些歌咏王昭君的诗,“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就是其中的名句。《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读翦伯老〈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是对翦伯赞先生有关王昭君深度研究的介绍,有助于人们对王昭君身世及其子孙后世的了解。

内蒙古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祥地,许多少数民族从这里起步。马背民族的部落联盟体制与汉文明发生了碰撞。《论辽太祖》一文较为清楚地描述了契丹民族体制的形成,此文一开始就说:

十世纪末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皇朝,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辽对峙是中世纪的中国继魏晋以后又一次出现的南北朝。辽皇朝强盛时统治着大半个北部中国,汉族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给予了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贵族

重大的影响。阿保机通过逃入契丹的汉族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大量地吸收汉族的封建文明,在较短的时期内,契丹社会由家长奴隶制跃进到封建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在契丹社会内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受到外部影响的结果,但这也需要通过历史人物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完成。而辽太祖阿保机正是顺应当时契丹社会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人物。

内蒙古是辽太祖生于斯,长于斯,建都于斯,且葬于斯的地方。在这里,阿保机完成了他对契丹社会由部落联盟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改造。他对契丹社会的改造,也是他巩固自己权位的过程。阿保机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有:

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巩固契丹政权的统治。契丹族在历史上形成国家时,汉族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汉族的封建地主阶级有着丰富的治国和统治人民的经验。阿保机虽然起家于漠北的部落酋贵,但由于他长期以来与汉族交往,故知道要统治汉族人民就必须吸取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因此阿保机进入汉族地区后,极注意对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吏的留用。为了发挥汉族知识分子的才干和作用,使他们契对契丹国家的巩固作出贡献,阿保机对汉族知识分子是优礼相待、宽大为怀的。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阿保机为了充实内部,把大批以汉族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迁徙到辽的内地和边境地带。这些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一带的部分地区。大批劳动力进入这些地区后,对祖国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个过程中,祖国东北边疆的部分地区得到开发,为后来的封建王朝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尽管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巩固契丹国家的统治,但客观上却是建设了祖国的北部边疆,特别是汉族先进的劳动技能、生产工具和农业知识通过汉族人民传播过去,这对推动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有很大作用的,而汉族与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杂居,这对加强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因之辽太祖的这些活动是值得肯定的。

《论辽太祖》一文最后的这些结论,应该说“诚哉斯言”。

辽朝很快被金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蒙古,成吉思汗登上了历史舞台。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文章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一部近千页十六开本的《成吉思汗研究文集》。考虑到这一状况,本卷选择了舒振邦先生的《成吉思汗系年要录》。舒振邦先生是一位研究北方民族史卓有建树的学者,不久前仙逝。据闻他有二十余万字的《成吉思汗年谱》手稿尚未出版。《成吉思汗系年要录》应该是《成吉思汗年谱》的雏形。

“系年要录”是一种史书体裁,是编年体的一种形式,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著作是宋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库全书提要》对此书的评论是:“其书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牘奏议、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

《成吉思汗系年要录》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体例,以纪年为纲,每年为一节。纪年叙述形式以公元纪年起首,接下来是金朝年号纪年、宋朝年号纪年、干支纪年,最后为成吉思汗的岁数。从1162年一岁起,迄于六十六岁,1227年。纪年之下,记成吉思汗于该年所行

之事。在记事之句中或句末,对于文中提到的不同译语及行事来源,作者予以注明,并冠“注”字标明。该文记事主要依据《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并参以《金史》、《元史》志传、《长春真人西游记》、《马可波罗行记》、《辍耕录》、《元史语解》、《元文类》、《续资治通鉴》、《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元史译文证补》、《元秘史山川地名考》、《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诸书。每年之末,或有按语。

《成吉思汗系年要录》中按语大都为对史实的考定,也有对史实的评论,这些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过于繁缛,以下摘录一段关于成吉思汗本人的按语。

按: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年青时代的帖木真,确实极端艰苦。年方九岁,父亲也速该即被塔塔儿人毒害,孤儿寡妇,受尽欺凌。羽毛未丰,本人也被泰亦赤兀惕人抓去披枷示众,备受侮辱,生命几乎不保。新婚不久,蔑儿乞惕人又来突然袭击,妻子也被抢走。至于生活中的含辛茹苦,忍饥挨饿,更加不用说了。这些对于后来担当蒙古族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而且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有益锻炼。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从幼年时代的偏激狭隘,同室操戈,兄弟相残,成为后来史书所称颂的有人君之度,能容众,能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能束其众以抚其下,深沉有大略等等,不能说与他年青所经历的患难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和我国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重大作用的汉族历史人物一样,都有其艰苦曲折的锻炼过程,并非一生下来就有“人君之度”的。

此文最后一段作者摘录三部史书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作为结语,转录如下,借此以窥全豹。

史书说:“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注】此据《元史·太祖本纪》。《新元史》谓“天下之势,由分而合,虽阻山限海,异类殊俗,终归统一。太祖龙兴瀚漠,践夏戎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天将大九州,而壹中外,使太祖挾其藩,躡其途,以穷其兵力所及,虽谓华夷之大同,肇于博尔济锦氏可也”。《蒙兀儿史记》则说“旧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度,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信然。独惜军锋所至,屠戮生民如鹿豕,何其暴也。及至五星聚见东南,末命谶语,始戒杀掠,岂所谓人之将死,其言善欤!蒙兀一代,并漠北四君数之,卜世十四,卜谶语年薪百六十,唐宋以降,享国历数,未由蹙于是者。于戏!可以观天道矣”。(【注】此外,古今中外,关于成吉思汗的评论举不胜举,这里就不一一摘引了。)

正如舒振邦先生所言,关于成吉思汗的文章举不胜举。或云: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一个人物的成长,与之所在社会的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能为大多数人认可。为展现这一人物,我们选择另外一个角度,把目光放到与之一同生活成长的亲人们身上。

《诃额仑夫人及其历史作用》论述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夫人。成吉思汗九岁时丧父

被部落抛弃,诃额仑夫人将几个孩子在艰难困苦中扶养成成人。“帖木真并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有大才干的人,更不是获得什么天机,而是自幼就接受了诃额仑夫人的教育培养,把各种经验教训和自己部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更有成效更灵活地利用自己和他人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时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是该文对诃额仑夫人家教做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诃额仑夫人在成吉思汗成长中发挥的作用,这一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日后的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同母弟——哈撒儿在蒙古草原上以其勇武善射而著名。他在蒙古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与成吉思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隔阂,《哈撒儿生平述略》一文详细叙述了哈撒儿的生平行状,也对他的功业作了很好的评价。其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是以下这段话:

时至今日,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各旗、县,哲里木盟的10个旗,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和达茂联合旗的一部分,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三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彥郭勒蒙古族自治州以及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青海省的绝大部分蒙古自治州、县,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等,原来都是哈撒儿及其后裔所属部落。……哈撒儿在蒙古人中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史书是人脑对客观历史的加工,人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认识与理解总会受到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个人能力、思维盲点等各方面的限制。在中国蒙古族人口中,哈撒儿及其后裔所属部落占相当大比例。这是历史演进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如果追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必然要把视点停留在哈撒儿本人身上。很可惜,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从现有的史料找到与之相关的线索。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哈撒儿在世时就与他身边的其他重量级人物有着不同素质,做出不同于其他人的事业。这些在当时很可能只是一些细微的小苗,数百年后结成了累累硕果。

在蒙古帝国中,对中国历史发生影响最大的人物,除成吉思汗之外,恐怕就是忽必烈了。对于忽必烈,本卷选择了《忽必烈与元代的统一——兼论元代的历史地位问题》一文。该文叙述了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全过程,并指出,自唐末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宋朝政府不但未能解决这一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战乱反而越来越严重;以忽必烈为首的新兴蒙古族势力,“结束了自唐宋以来四百年左右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分裂割据状态,使我国又一次出现程度更高、范围更广的空前大一统局面,……”忽必烈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接受汉族谋臣张文谦、刘秉忠的建议,多次颁布命令禁止滥杀无辜,以收拢人心,减少了进军的阻力,成为他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元朝创立的行省制度以及遍布各地的驿站、科技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元曲等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影响。文末,作者提到了元军伐宋时常州、静江的屠杀,以及文天祥抗元等问题。此文发表于1981年,“文革”结束不久,学界思想还没完全从此前的阴影中解脱出来,有些观点或方法,在时下看来可能略有陈旧之感。比如说,对于元朝的整体生产力与宋朝相比,作者的笔触就没有涉及。

“每遇疑难渠工,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流痴立。及豁然有悟,往往登高狂呼,临河踊跃,以为生平第一快事。”这段文字颇为精彩,写出了一位沉浸在自我世界中的开拓者,

用思想利斧披荆斩棘,左冲右突,终于破五关,斩六将,大获全胜的思路历程,如果不知道这几句话的背景,尤其是把第一句话的“渠工”二字去掉,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段文字的主语对象应该是一位思想家或发明家,也可能是一位电脑编程高手。这些猜测都错了,这个人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壮劳力,也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武士,是一个普济大众的慈善家,也有人把他说是心狠手辣的黑老大,他是一个富可敌国的财东,更是一个有“河神”之誉的水利专家,这个人就是王同春,而上面那段文字摘引自《绥远通志稿·王同春传》。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学术界泰斗级的人物,在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饶有建树。他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学说,创建了史学界以疑古辨伪为宗旨的“古史辨”派。1934年,这样一位国学大师正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突然从“夏、商、周、禹、汤、文、武”的上古世界中抽出身来,为一位边塞农民写传记。这位边塞农民是何等人物,做出了何等功业,才将一位国学大师的眼光从故纸堆中吸引到了他身上?

读完顾颉刚先生所写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人们就会明白,王同春是个奇人。《临河县志》云:“每有大工,他人咋舌束手,退避不惶者,先生从容措手,高下之宜,向背之势,得失顺逆之局,均能测于机先,定于临时。一时造门请者,得其只言片语,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是其果有异术哉,盖其经验有独至者。”王同春先生确实有异术,他除年节外,天天在河套平原上奔波,查地形,观土质,视河流,览波澜。河套大地的水文地貌,烂熟于胸,再加上“俯而察,仰而思,面壁终夜,临流痴立”,经验加思索的升华,“异术”自然也就形成了。

《重修河套四大股庙碑记》云:“是地距河咫尺,开渠浇田,咸仰黄河之水,数十年来,商人不啻千百,屡开屡淤,工巨利微,几成荒土”。王同春主持工程之后,“遵夏禹王导河之法,仿李冰开渠之规,渠口广狭合度,支渠深浅得宜,高不病旱,卑不病涝,耕者数百户,咸获其利。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家给人足,老安少怀。虽藉二仪之造化,实资一人之经济。”别人开渠,“工巨利微”,“屡开屡淤”,王同春开渠则“高不病旱,卑不病涝……二十余年,不知歉岁”,天地造化也需靠“异术”方能造福于人。

“遵夏禹王导河之法,仿李冰开渠之规”。民间称王同春为“河神”,文人则喻之以大禹和李冰。大禹暂且不提,即使把王同春与李冰相比,相信不少人仍然会不以为然。历史的比拟总是危险的,我自己对这种想法也有疑虑。李冰生活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王同春与之相隔两千多年,从时间上看王同春占了便宜,但是,清末民初时代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西北边塞的生产工具与两千年前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李冰是秦国的郡守,他可以调动全四川的人力、智力,甚至秦朝政府的资源来修水利;王同春是个几乎不识字的逃荒农民,完全靠四处奔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苦思冥想,与水奋斗,与地奋斗。那时的河套,几乎是一片荒野,王同春在与地、与水奋斗的同时还要与人奋斗,同行间的争斗、官府的要挟、土匪的捣乱,他的水利事业只能在夹缝中运作,至少在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上,王同春不输于李冰。

李西樵先生,河南人氏,我曾与这位先生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了解一些他的身世。抗战爆发之后,他投笔报国,来到内蒙古,在傅作义创办的《奋斗日报》工作,建国后曾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总编。1957年他被打为右派,发配到河套一带,改革开放后调回呼市。先生一生笔耕不辍,他在河套地区工作了数十年,于河套掌故非常熟悉。《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王同春》一文,是李先生对王同春的全面总结。文章中有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激,那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而已,不足为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邓野先生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这是近年来在傅作义研究上的一个突破。文章的第一段就作惊人之语: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中国,你可能什么都没学,但不会没学过政治。从小学到研究生,不同学年所有专业的共同课就是政治。假设有人没上过学,弘扬主旋律的电影、电视,以及数不尽的宣传方式也会把政治意识在不经意间灌输到你的脑海里。国共政权易手过程中的那些纵横捭阖的人物形象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已经成为思维定式,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这是经过“极力遮掩”,“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这几句话犹如惊天霹雳,令人有五雷轰顶之感。邓野先生用缜密的思路、丰富的史料,尤其是《徐永昌日记》,一步步地把当年发生的事摆在读者面前,读后,你会感到邓先生所言确然不虚,真可谓灌顶之醍醐。

1949年初,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在自己与国民政府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但并非一下子死心塌地彻头彻尾地皈依中共,这期间有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延续了八九个月,一直到十月,从北平到绥远才完成政权的彻底易手。

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毛选》第三卷的《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该文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时间是在1945年4月24日。到了1949年,傅作义再提四年前口号,已经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了。口号只是宣传,兵临城下,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地区的傅作义部队尚有三万余人,当时的广州政府并没有将之遗弃,“广州每月发给部队薪饷副食费三十五万银元,主食军粮价十三万六千银元。”如何处理绥远问题,成为国共双方的一个焦点。

徐永昌,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二人私谊甚深。1949年10月以前的这段日子里,徐永昌多次来往于南京与北平、广州与绥远之间折樽冲俎。8月28日傅作义回到绥远,9月17日徐永昌也来到包头,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傅作义的一些思想。

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

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

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

9月19日,傅作义向徐永昌亮出了他的全部底牌,邓野将其总结为:

傅将中共最痛苦的时期判定为1950年三四月间,这是指中共难以渡过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农场,将干部放入农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担任绥远省主席时,欣赏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学说,在绥远推行过教育、生产、武装三位一体的农村制度,即教、养、卫制度。傅所称利用合作农场,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傅的计划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赢得发展时间,届时便可“打出去”了。这就是“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的意图。随着这个计划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是内蒙古的一件大事,邓野详细描述了当时这一过程的起伏波澜。事实上绥远通电仪式从18日上午就开始了,董其武签了字,孙兰峰则没有。其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商谈,终于出现了9月19日的那一幕。

现在,将9月19日在绥远发生的事串联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清晨,孙兰峰签字之后,起义通电的签字手续圆满完成;上午,傅与徐深谈,亮出了寓兵于农的底牌,并递交了一份全面献计献策的上蒋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邓宝珊出面将徐赶走;下午,徐于2时飞离,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至此,傅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政治交代;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接下来的事情,因与邓无关,故该文未言。为使读者看出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特摘《百度百科》补述如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46个单位的代表共662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十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王若飞在狱中》是五六十年代正在读中小学的人非常熟悉的一本书。说句实话,那是一个大众读物极端枯竭的时代。《水浒传》、《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虽然没有正式封禁,

但绝不是大人们——老师、家长们提倡读的书。翻译的苏联或俄国小说不少,但对于刚刚进入疯狂阅读期的青少年,门坎儿又太高。除了《林海雪原》、《苦菜花》等小说外,既有可读性,又能强烈灌输当时价值观的书寥寥无几,《王若飞在狱中》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杨植霖所写的《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

王若飞,贵州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31年“党就派他到内蒙古地区,开辟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当年在包头与乌兰夫联系时被捕,关押在绥远省“第一模范监狱”,直至1936年,因此与内蒙古结下不解之缘。曾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植霖与王若飞同为狱友,写下了《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起初在《内蒙古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发行了小册子。

小时候读《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非常感动。不妨摘几段原文:

绥远省政府门口,写着几个大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是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早成了蒋宋孔陈的私产,国民党内究竟有几个人不贪污,不腐化,真正给人民办事的呢?

“什么民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批强盗!所谓‘紧急治罪法’,无非是保护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律!试问制订这种法律的时候,有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其他劳动者参加过?你们执行这种法律,只能说明你们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封建势力的工具,是他们忠顺的奴仆而已!”

“你们在讲什么?”

“听黄先生讲《孟子》。”青年人说。

“讲的哪一段?”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没有人宣传共产主义吧?”

“没有,”青年人摇摇头,“我们只研究了个‘民为贵’,关主任,今天我們才真正懂得了,人民,应该是主人。”

“我有什么罪?我犯的是反对你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投敌卖国的罪行的‘罪’!是反对你们专制独裁、剥削人民、欺压人民、贪赃枉法的罪行的‘罪’!如果你们真是英雄好汉,如果你们还有一丝一毫的天理良心,咱们就到大庭广众中去,让群众评一评理,……”

“至于说,在将来的新社会里,知识分子会不会比旁人特殊一些呢?”若飞同志接着说:“不行,绝不允许这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管你学问多大,本领多高,只能给社会上多做些有益的工作,绝不能凭借学问、本事骑在人民的头上。如果有人胆敢那样做,他马上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八十年前王若飞在绥远监狱中讲的这些话,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沉思。如果不考虑沙影桑槐,他的这些话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这本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理想主义者,具有强烈的人格魅力。他在监狱里锻炼体魄,宣扬信仰,与狱方斗争。狱方为降服他,特意把一些“顽劣”犯人和他同居一室,没想到,这些人没用多长时间,都为他所感化,成了他的战

友。他把监狱作为战场，一封封地给当时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写信：

此外，他还写了《王阳明学说批判》和《易经批注》。《易经》这本书本来是傅作义先生送给他，打算用这本书影响他的思想；可是若飞同志看后，很感兴趣，说是一部好书，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易经》做了全面分析，连傅作义看后，都不禁慨叹地说：“他把《易经》给讲活了。”

从《王阳明学说批判》和《易经批注》看，王若飞的国学水平绝非寻常。他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文章：

在我和若飞同志相处的二年多的时间里，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他顶少写了二十多万字。在那些麻纸、手纸、包装纸、线装书、书报废纸的字里行间，用芦柴棍写着秀丽的蝇头小字，整整齐齐，一笔不苟。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纸片上，闪耀着多么光辉的思想，蕴蓄着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力量！

王若飞的个人魅力来自于他的刻苦学习。年轻时就勤奋好学：

若飞同志刻苦学习，顽强地学会最难的功课。下课以后，就从黄老的书架上，找出自己心爱的书，认真阅读。读过的书，就把自己的心得，写在一本日记本上。有些书，连黄老都不晓得他是什么时候读完的。不料，在期考时，因答卷答得不好，被留级了。若飞同志对留级并不介意，舅父和老师都非常关心。当级任老师偶然在他的床头，发现了那本日记时，不由得大大地吃惊了。从他的日记里看得出来，他不但读过很多的书，而且都有深刻的理解，可是他从来没有在人前炫耀过自己。老师在吃惊之余，不但让他照样升级，而且破例跳了一班。黄老讲完后，慨叹地说：“他学习办事，总是这样不夸不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多少年都是这样。”

狱中一次大病之后，王若飞这样说：

“我病了二十多天，报也少看了，英文也给停了，这样下去，非落后不可！”

王若飞还苦学英文：

另外的时间，就是学英语。他本来已经懂得日文、法文和俄文。可是英文还不行。监狱里学习外文是有限制的，经过几番交涉才批准他可以买英文书籍，他买来中学用的英文教科书，英文本《三民主义》，英华合解字典，学习起来。他说：“学会一种外国文，就等于打开一个新天地，也等于掌握了一件新的武器，更有利于进行战斗！”

20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绥远监狱中的一幕幕故事，通过《若飞同志在绥远狱中》展示出来，现在读起来仍然回味无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的所思所为。八十